

朱光亚在中国科协做的三件大事

□ 吴伟文

1991至1996年,朱光亚担任中国科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作为中国科协的当家人,朱光亚毫不懈怠,不忘党建立群团的初心,牢记履行群团桥梁纽带职责的使命,把紧密联系科技工作者、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作为科协工作的首要和重要任务。在这5年里,朱光亚为中国科协做了3件重要的事情。

一是朱主席为青年科技人才成长不遗余力。朱光亚接任科协主席期间,正值市场经济浪潮,那个年代流行这么一句话,“造原子弹、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当时科技人才流失严重,科技界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朱光亚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坚决维护科学尊严,并积极扶持青年科技人才,倡导、鼓励青年学者筹备、组织、主持青年学术年会和青年科学家论坛活动。

在朱光亚的推动下,1992年,中国科协首届青年学术年会成功举办,让年轻人在学术活动中崭露头角,得到历练。紧接着,1993年的全国首届科技人才技术交流洽谈会,开创了中国科技界人才合理流动的先河。这些活动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1995年举办的青年科学家论坛首次活动上,朱光亚勉励青年学子,继承发扬老一辈科学家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精神,在学术争鸣中茁壮成长。

二是朱主席履行群团反映呼声、维护权益的职责。为了更好地为科技工作者服务,朱光亚倡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国科协三大提出的“科技工作者之家”。其中,反映科技人员的呼声诉求,维护科技人员的合法权益,是建“家”的重要内容。

1994年3月,朱光亚代表科协界在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作大会发言。他为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困难和诉求发声。5位科技专家因宣传科学灭鼠而被法院宣判一审有罪,他代表中国科协坚决支持他们上诉,维护了科技工作者的合法权益。这次大会发言,获得全场多次热烈掌声,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此次事件后,朱光亚还支持中国科协党组联合国家科委积极讨论制定关于加强科普工作的政策文件。199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发布,把科普工作提到了关系全局的战略地位。

第三件事情,更是直接与科协作为党领导的群团性质有关。在1993年机构改革中,他致信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力陈科协应留在“党群口”发挥群团作用,得到中央支持,使长达10年的科委“代管”科协局面得以终结。

朱光亚虽然只当了短短5年的一届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主席,但他接续了前任周培源、钱学森两位主席的努力,厘清了政群关系,并在中国科协五大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必须从党的群众工作和国家科技工作两个方面,全面理解和把握科协在全党全国工作大局(现在表述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坚持和捍卫了科协的性质宗旨,为中国科协在21世纪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30年过去了,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薛其坤、中国科学院原院长白春礼等为代表的当年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青年学术年会和青年科学家论坛的组织者、参加者,已经成长为我国各条战线特别是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和中坚力量。正如朱光亚在首届青年学术年会开幕式讲话中描述的那样,“这21世纪的采摘季节,成为他们最光荣、最美好的时刻”。

(作者系中国科协原调研室主任、研究员)

静水流深 科学大家



1991年5月23日至27日,中国科协四大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召开,朱光亚当选为中国科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图为朱光亚(右)和钱学森(左)在会议期间亲切交谈。



图为在东北人民大学执教期间,朱光亚(前排中)与物理系普通物理教研室同事在新物理教学楼(红楼)前合影。



图为朱光亚、许慧君夫妇在家中弹钢琴。



图为1995年10月20日,朱光亚在上海科学会堂观看中学生演示自己动手制作的小火箭模型。

本版图片均由中国科协提供

编者按 12月25日,是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朱光亚诞辰100周年纪念日。由中国科协主办的“惟愿一生成一事——纪念朱光亚诞辰100周年专题展”也于日前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开展。朱光亚的一生将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牢牢联系在一起,让我们从那些散落于时光的故事中,感受他亲切质朴、淡泊名利的大家风范。

一生为中国研究核武器

□ 科普时报记者 毕文婷



他是我国核武器研究领域的“众帅之帅”,也是儿子心中始终严谨执着的父亲。他就是朱光亚。在他的身上,有很多响当当的称号。但他最看重的只有“研究员”3个字。

人生为一大事来。用朱光亚的话说,“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但这件事却是新中国血脉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力量。

“我只是一个瓶子口”

“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1950年初,在《给留美同学的一封信》寄出的第二天,朱光亚毅然拒绝了美国提供的救济金,告别了未完成的学业与热恋的爱人,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返回祖国。

自1938年离开武汉,他已12年未归家乡。但一封来自北京大学的加急电报,让朱光亚只在家中待了两天半便奔赴北京。他在日记中写道:“游子离家多年,如今又要远行,总是不能伺候年老的双亲,深感内疚。”

回国后的朱光亚,成为北京大学物理系最年轻的副教授。他也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担任外文秘书,还曾作为中



图为1947年,朱光亚(右二)与杨振宁(右三)李政道(右一)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聚会。

国原子能代表团顾问之一赴苏联考察访问。1958年,经钱三强推荐,朱光亚

作为技术带头人,开启了中国自己的核武器研制之路,当时他只有35岁。

这是一趟注定充满荆棘的旅程。在大西北的戈壁深处,一大批技术人员从四面八方赶来,但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从未见过铀是什么样子。

当时,朱光亚不仅要解决技术上的难题,还面临着如何统筹人才资源的挑战。他走遍核武器研究所的每个研究室,深入学习力学、化学、材料等各领域知识,为原子弹研制工作制定路线图。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院长、核武器工程专家胡思得院士曾说,在原子弹研制的舞台上,“朱光亚起着诸葛亮式的重

要作用”。而朱光亚在回忆这个时期的工作时,却只把自己比作一个瓶子口——把上面的方针和下面的意见承上启下。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在爆炸前的最后几天里,朱光亚一直坚守在现场指挥部。最后的插雷管环节,朱光亚放心不下,又登上铁塔检查、验收,直到倒计时清场时才最后一个撤离铁塔。

但当核爆时间一分一秒临近,朱光亚却不在指挥所。原来,他的司机走错了路。在茫茫戈壁中,朱光亚只能遥望那朵腾空而起的蘑菇云,潸然泪下。那天晚上,他平生第一次喝醉了。

“带弹着陆,我负责!”

氢弹三次甩投,都没投出去!

1971年底,空投小型氢弹试验任务现场,飞行员杨国祥驾驶国产新一代强五甲型飞机首次进行甩投投弹试验。

第一次尝试失败后,在现场最高指挥员朱光亚的同意下,杨国祥又进行了两次甩投,都没能成功,而飞机所剩的燃油仅够支撑返航,无法再进行第四次试验。

但是,飞机极有可能在返航时引爆这颗几十万吨TNT当量的氢弹,这一

当量是美国在广岛投下的那枚原子弹的10倍以上。紧急关头,朱光亚毅然拍板:“带弹着陆,我负责!”

带弹着陆前,机场要求所有工作人员进入防空洞。而朱光亚坚持留在现场指挥,等待飞机降落,在此过程中氢弹距离地面最近时只有10米左右。

事后,朱光亚轻描淡写地说:“这次的‘副产品’是我们做了一次带弹着陆的试验。”其实,对于这个小概率事件,



图为我国早期地下核试验场景。朱光亚早已做了详细预案。这样的严

谨细致,是朱光亚在学生时代就已养成的习惯。

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朱光亚的数学考卷连标点符号都准确无误,想扣掉一分都难。

这个习惯,朱光亚也言传身教给了孩子们。朱光亚的长子朱明远回忆说:“父亲对我们最大的要求就是一丝不苟。一道题可以不会做,但如果会就必须要做对,不允许出现把加号写成减号这种低级错误。”

两次喝酒为辞官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极少在我们面前主动喝酒。”1996年的一天下午,朱光亚兴致勃勃地回到家,招呼儿子朱明远“喝两口儿”。朱明远当时很奇怪,这是怎么了?“我把中国科协主席辞了!”朱光亚高兴地说。

两年后,主动提喝酒这一幕又在家中重现。这次朱明远有了经验,抢先一步问道:“你这是又把什么辞了?”“中国工程院院长!”朱光亚乐呵呵地答。

对于普通人来说,升官是最快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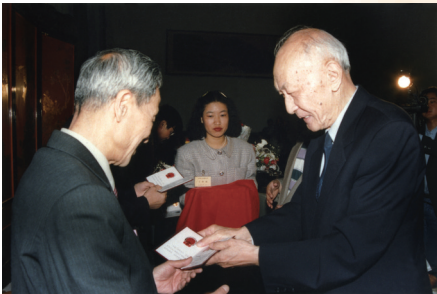
事情之一,而对于朱光亚却成了负担。这两次请辞后,朱光亚身上的行政职务算是卸下了,他终于可以专注于自己的科学研究。

“‘院士’不是职务,也不是职称,只是一种荣誉称号,不能作为一种称谓使用。”朱光亚在一次审阅“863计划”项目组提交的简报时做了这样的批注。无论是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还是中国科协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朱光亚从未将这些名号放在心上,他所在意的,不

过只是那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

2004年,为表彰朱光亚对我国原子能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10388号小行星命名为“朱光亚星”。但朱光亚却说:“以我的名字命名一颗小行星,我不敢当……我个人只是集体中的一员,做了一些工作。”

细推物理即是乐,不用浮名绊此生。遥远苍穹,他是最亮的星。



图为1996年6月,朱光亚(右一)在中国工程院第三次院士大会上为新当选院士颁发证书。